

# 《人民至上》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人民至上》

13位ISBN编号：9787208110816

10位ISBN编号：7208110816

出版时间：2012-12-1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罗岗

页数：22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http://www.tushu000.com)

# 《人民至上》

## 内容概要

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员罗岗的《人民至上——从“人民当家作主”到“社会共同富裕”》由张维为、汪晖推荐，是一本面对大历史、迎向大现实、展望大未来的著作，该书对中国革命之路和现代之路进行了探讨，阐述了这条成功之路走到今天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又面临哪些危机和困境，以及如何才能应对危机走出困境，其中一个核心的宝贵资源就是人民主体、人民主权、人民至上。罗岗从明清变局入笔、以鸦片战争开篇、中经中国革命的挫折和胜利开出“延安道路”的新篇章；以中苏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选择，引导出中国改革为何成功，而苏东改革却导向国家解体；最终分析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道路走向何方。该书讨论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问题，但更关注文明、文化、道德和价值观的问题，从社会、历史、政治和经济入手，以文化、文学甚至是影视和其他大众文化作品来加以说明，展示出一条不限于社会科学而呈现更多人文关怀和文化研究的思路和言路。

# 《人民至上》

## 作者简介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思勉高等人文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书籍目录

### 目录

导论 在中国，何处发现历史？

- 一、“中国中心观”的限度
- 二、“文化自觉”与主权“独立”
- 三、重新寻找“20世纪中国”的“剧情主线”

第一章“乡里空间”的崩溃与“士绅共和国”的失败：走向“民众大联合”

- 一、“绅权”即“民权”：历史脉络的勾勒
- 二、“乡里空间”与“各省之力：革命线索的描绘
- 三、“权绅化”与“劣绅化”：失败缘由的记录

第二章阿Q的“解放”与启蒙的“颠倒”：重置“知识分子与民众”的构图

- 一、“鬼魂”与“革命”：解放了的阿Q
- 二、“民国理想”与“人民主权”
- 三、启蒙的“颠倒”：“找着群众的野兽性”

第二章“劳动人民”与“按劳分配”的悖论：社会主义改革的内在逻辑

- 一、“劳动的胜利”：“个人”与“集体”的矛盾
- 二、延安经验：“机器论”与“集体劳动”的高度
- 三、打破“循环的陷阱”与新的危机意识
- 四、“资产阶级法权”及其不满
- 五、“按劳分配”的悖论与中国改革的逻辑

第四章“共同体”、共同富裕与“共产主义理念”：我们拥有怎样一个未来？

- 一、中国革命：“共同体”理想的创造性转化
- 二、“自下而上”的改革：“新集体主义”的可能
- 三、“勤劳革命”与作为“政治规划”的“共同富裕
- 四、“共产主义设想”的中国视野

后记

##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通过对“阿Q正传”四个字的推敲，汪晖揭示出“阿Q”能以“正传”的方式浮出历史的地表，既要与传统“正史”的谱系决裂，也要争取“新文化运动”所开创的空间，又要警惕这一现代性的空间成了新的压抑性力量……尽管他已经意识到无论是为“正传”正名，还是为“阿Q”命名，都“涉及名实问题，以及与名实问题直接相关的秩序问题”，但汪晖基本上把他对“序”讨论限制在“命名”问题和“语言”问题上，或多或少地忽略了与“名”相对的“实”问题，与“语言”相对的“秩序”问题。具体而言，其中的关键是关于“阿Q姓什么”，汪晖也在文章中提到这个问题，但被他以阿Q“无名无姓无来历”所一笔带过：“立传的通例，要知道他姓什么，但阿Q没有姓。好像姓过一回赵，但很快就不行了，赵老太爷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然而，如果我们回到这篇“序”的文本，就不难发现谈到“阿Q姓什么”时，“作者”似乎放弃了原来讨论“正传”那种多少有点“掉书袋”的书生口吻，转而使用现代小说叙述者的客观语调，描述了阿Q自以为“姓赵”却被迫“不能姓赵”的故事：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阿Q正喝了两碗黄酒，便手舞足蹈的说，这于他也很光采，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其时几个旁听人倒也肃然的有些起敬了。那知道第二天，地保便叫阿Q到赵太爷家里去；太爷一见，满脸赭朱，喝道：“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阿Q不开口。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阿Q并没有抗辩他确凿姓赵，只用手摸着左颊，和地保退出去了；外面又被地保训斥了一番，谢了地保二百文酒钱。知道的人都说阿Q太荒唐，自己去招打；他大约未必姓赵，即使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如此胡说的。此后便再没有人提起他的氏族来，所以我终于不知道阿Q究竟什么姓。这一段描述性的文字，在以议论为主的“序”中显得有些突兀，但和正文的小说笔调却颇为合拍。如果将关于“正传”以及“阿Q”名字的叫法和写法的讨论，都当作为“小说叙述”而做的准备，那么这段描述就可以看作是整篇小说的叙述起点，因为在这里涉及的不是抽象地讨论“作者”为“传主”“命名”的“语言”的问题，而是具体地描绘在“实际存在”的“乡村秩序”中一个底层乡民如何被驱逐、被欺凌的情形。

## 后记

当责编不断催促我写“后记”时，我才愈加强烈地意识到这还是一本“未完成”的著作。说它“未完成”，并非自谦。首先因为写作时间紧，全书可谓“急就章”，不少内容甚至是在旅途中完成的，而且原来设想的一些章节最终也没有写入书中，只能留待以后的修订和增补了；当然，更遗憾的是我对中国现代历史、中国革命经验和中国改革进程的认识和思考同样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况，许多重要的问题和关键的难点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辩论与突破。因此，即使就本书提出的诸多命题和构想而言，也不是一本书或者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它召唤着更多的志同道合者参与其中、相互砥砺、彼此辩驳、共同进步。无论是这本小书的“未完成”，还是个人思考的“未完成”，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相比，自然是微不足道的。但这一伟大的事业同样处于“未完成”的阶段。早在20世纪40年代，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在回国考察重庆和延安等地之后，深深地被中国共产党人的“延安精神”所折服，一方面展望未来，“假如更多的人像他们那样刻苦耐劳、埋头苦干，我们中国一定可以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另一方面却也未免有点担心和忧虑，“然陕北地贫，交通不便，商业不盛，地方非广，故治理较易风化诚朴。设中共若握东南富庶市场，区域广大，不知能如此廉洁，兴利除弊，为人民造福如延安精神乎？”（陈嘉庚：《南侨回忆录》）当时有着同样担心和忧虑的远不止陈嘉庚先生，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诤友”，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在与毛泽东的“窑洞对”中，更尖锐地提出了质疑：我生六十多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朝历代，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是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日久天长，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面对这一来自中国历史深处的忧虑与质疑，充满信心地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延安归来》）即使到今天，国家富强了，人民富裕了，环境复杂了，难题增多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伟大事业既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却也面临严峻的考验：探索“为人民造福”、“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和“人人起来负责”的“民主新路”，依然是关山万里、任重道远，依然是“在路上”、“未完成”的伟大长征！此书的完成与出版，首先要感谢陈昕先生，这几年他在上海书展期间举办“世纪中国论坛”，以出版家的敏锐倡导知识界关注中国现实、关心中国问题，很大程度上激励了我的写作；感谢为松兄，如果没有他的鼓励和督促，这本小书根本不可能如期完成；感谢陈雷兄，倘若没有他的认真和执著，倘若没有他从他们出版的相关图集画册中精心挑选了若干历史图片，本书则不会以现在这样的面貌和大家见面；感谢我的老师和朋友们，没有和他们长达十多年的学习、辩论甚至争吵，我很难想象自己的思考和写作可以抵达此时此刻的状态。最后，感谢我的学生们，这几年在课堂上围绕“革命”问题的反复研读和激烈讨论，是促使我完成这本小书的最大动力。因为从年轻人的身上，我看到了正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情、理想和希望。此书是献给你们的！罗岗 2012年11月12日，上海

# 《人民至上》

## 媒体关注与评论

重新认识二十世纪中国，重新解释这一时代的“人民”与“革命”，需要一场认识论上的变革。罗岗的著作通过勾勒了这一时代的几条关键线索，敏锐地回应了当代思想领域的若干重大问题。这是一项开放的探索，一个重构历史认识的邀请。——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作者汪晖 准确把握中国历史演变的逻辑，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今天和明天。这本书抓住了“在中国，何处发现历史”这一主题，梳理了各种对现代中国历史主线的解读，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值得读者细细品味和深思。——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震撼》作者张维为

# 《人民至上》

## 名人推荐

重新认识二十世纪中国，重新解释这一时代的“人民”与“革命”，需要一场认识论上的变革。罗岗的著作通过勾勒了这一时代的几条关键线索，敏锐地回应了当代思想领域的若干重大问题。这是一项开放的探索，一个重构历史认识的邀请。——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作者汪晖 准确把握中国历史演变的逻辑，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今天和明天。这本书抓住了“在中国，何处发现历史”这一主题，梳理了各种对现代中国历史主线的解读，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值得读者细细品味和深思。——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震撼》作者 张维为

## 精彩短评

- 1、深入浅出地示范了怎样用信服的各家理论来理解和论说自己的问题。
- 2、综述他人观点，但亦有自己一条思路在，遗憾的是二三章之间稍显断裂。大体而言，第一章是沟口雄三的“前近代”，第二章是汪晖的阿Q，第三章蔡翔的社会主义叙述，第四章是费老的苏南。【毁就毁在赵家式的书名上】
- 3、第一章最有启发，然后第四章，赞。名字好，再赞。
- 4、不错的好书 很喜欢 包装精美 值得推荐
- 5、学习文献综述的写法
- 6、从乡里空间的崩溃到寻找群众的野兽性，在中国传统内部理解国家、革命、人民，并由此叙述中国的历史文明。人民主权的建立是明清传统的延续，经过现代革命的重塑，在今天应当如何继续？这不仅是一个“设想”，更是中国的希望。
- 7、一本了解海外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概述性作品。考虑到传统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的僵化，该书力图引导读者重新认识传统中国和及其近现代的历史转型。书中章节对于历史的划分依据传统模式，但是对历史的理解却迥然不同，可谓旧瓶装新酒。作者文学研究出身，却运用了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的成果，突破学科限制，值得学习借鉴。出于对日本的本能厌恶，我基本不看日本人的研究，但是从该书对日本学者作品的引用内容来看，今后还是要多看看日本人的有关研究了，不得不承认，小日本的研究很好玩。不知何故，该书对于毛时代和邓时代的分析，让人有些云里雾里。
- 8、特别关注了机器论，罗老师从帝国的序言开始就直面欧左，算很业良了。虽然有一种文献综述的即视感，其实真挺不容易了。在写intro的我，由于功力问题，生生把它变成了[论文使用说明书+闭关读书报告]
- 9、引文有点多，像是一部长篇的读书札记。导论和第四章比较凝练。第一章中以历史视角仔细讨论了乡里空间，但据孙歌说，沟口的乡里空间是原理，我理解为一种心智结构，如同市民社会一样的构筑原理，不是实体，很难说崩溃，会在某时段里变型或遮蔽。
- 10、文学研究者对历史进行全景式反思，继续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脉络，提出引入社会学，人类学方法，改变“西方中心论”（冲击-回应模式，传统-现代模式，帝国主义-革命模式），但本书并没有自己的研究的落脚点，既非传统文本分析，也没有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更像一本读书笔记的汇总。理论野心太大，而缺乏现实感。
- 11、该书可以作为一本了解海外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概述性作品。考虑到传统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的僵化，该书力图引导读者重新认识传统中国和及其近现代的历史转型。书中章节对于历史的划分依据传统模式，但是对历史的理解却迥然不同，可谓旧瓶装新酒。作者文学研究出身，却运用了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的成果，突破学科限制，值得学习借鉴。出于对日本的本能厌恶，我基本不看日本人的研究，但是从该书对日本学者作品的引用内容来看，今后还是要多看看日本人的有关研究了，不得不承认，小日本的研究很好玩。不知何故，该书对于毛时代和邓时代的分析，让人有些云里雾里。
- 12、详做概述。
- 13、还是很依赖文本啊
- 14、第二三章五星，第四章三星
- 15、更想看罗老师写散文一样的文章，没有汪晖，没有沟口，没有巴丢，就全是自己的话。
- 16、完全熊抱着甘阳、汪晖。。。另：书名和封面还不错。
- 17、第三章做的文本分析非常独到，可惜纵观全书，尽是理念中的一些结构和概念在演绎，现实如何，历史真实情况如何，却很少有提及.....
- 18、由一系列读书笔记串联起来的历史叙事，体现了罗老师在中文系外的广博阅读。在写作形式上，这本书和李猛的《论抽象社会》很像，都是通过对二手文献的品评、取舍来搭建自己的叙事框架。而我对此书的疑问和在读李猛论文时的困惑也是类似的：没有对史料的分析整理，如何能对史学研究的正误优劣作出判断？最可靠的做法也只是从自己的读书笔记中整理出一套最融贯的说法。而对于一项史学性质的研究来说，这样的标准自然是不足的。
- 19、还是得抢占前排才行啊。。。
- 20、太奇怪了，为什么最后一章和前面差别那么大？所有的理论思辩和问题意识都不见了

## 《人民至上》

21、精彩！可惜被低端的宣传拖累了

22、略懂。。。

23、通过重读明清以来的历史，特别是有意识地 and 沟口雄三的对话，勾勒出了中国革命发展变化的一条线索。很有启发性。

1、导论罗岗说到这本书的任务在于“重新寻找‘二十世纪中国’的‘剧情主线’”，对此首先要对原有的“剧情主线”进行反思，他认为当下时兴的“主线”有两条：一调动“地方”消解“国家”，二是运用“文化”对抗“政治”。前一条主线与“在中国发现历史”说紧密联系，柯文认为以往的中国研究范式【可以概括为“冲击—回应”、“现代化（传统—现代）”、“帝国主义（帝国主义—革命）”三种】都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提出要回到对地方、区域、省份的研究才能真正发现中国近代发展的脉络与动力。柯文在一种“政治正确”的旗帜之下，将“现代化”与“民族主义”这样的宏观视角与“西方中心论”相联系使之污名化，这样无视了中国近代通过不断革命建立民族国家，并在此过程中深刻参与到“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事实。反观地方研究，要使得琐碎的“特殊性的研究”到宏观的“通论性的问题”也必然需要理论跳跃，甚至只是“理论冒险”，并不能达到其所标榜的切实性。后一条主线力图“文化”来把握近代中国的脉络，但无论是以往用“文化”来阐释中国的“劣败”，还是现在以之证明中国的“优胜”，甚至高远地提出21世纪中国将由“民族国家”变为“文明国家”，都必须首先承认一个事实：“20世纪中国为争取‘自主权’和‘独立权’的斗争与努力”才是“21世纪中国‘历史文明’回归”的历史前提与坚实基础。据此，罗岗认为，“政治”与“国家”是“二十世纪中国”不可消解的“剧情主线”，“20世纪中国革命”以及“革命”建立的独立自主的“国家”既为“现代中国”创造了内在规定性（“人民共和”），也规划着相匹配的政治形式（“宪政国家”），只有认识到“人民共和国”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和国”这一最大的政治，才能深入把握这一“剧情主线”。一、而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革命主体的下移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动员，也即是皇权、绅权、民权三者的迭代，而绅士阶级在这一过程其中起着重要的过渡作用。明清时期由于专制皇权恶化，儒家知识分子由“得君行道”转为“觉民行道”，由上层路线转为“乡治”路线。【余英时】同时在明末直接代表皇权控制地方的“里甲制度”崩溃之后，一种由官、民、绅共治的“乡里空间”开始形成，而“绅”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明末如东林党运动以及黄宗羲等思想者的言论（如黄所说的“民权”实是指“富民乡绅的权利”、顾炎武“封建论”所描画的当时“乡治”的蓝图），标志着绅士阶层的政治主体意识已经觉醒并开始承担起历史使命。而这一“乡里空间”的发展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开始有了“质”的变化，清政府为了抵御叛乱不得不分权给地方，导致了淮军、湘军为代表的“军事地方化”，民初的军阀政治于此肇源。而“辛亥革命”在“乡里空间”膨胀、地方势力兴起的基础上以“联省”的形式展开，正是这一历史趋势发展的结果。【沟口雄三】这一“乡里空间”为核心的历史叙事，隐含着沟口从中国传统内部发现“革命”动力的意图，但却难以解释何以中国最终并未停留在“联省自治”而走向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同时“民国”确立的“主权在民”的原则，也与“乡里空间”的“士绅主导”颇有差距。沟口只看“士绅主导”理想化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其势力膨胀的“权绅化”与其“劣绅化”相伴随的一面，没有解释为何士绅阶层由革命的主体转为革命的对象之一。二、“辛亥革命”虽然褒贬不一，但其树立的“以四万万为主”的“民国理想”与“人民主权”却异常可贵。一方面这种“人民主权”的确立，是对原先“士绅主导”合法性的颠覆。对此，罗岗颇为精彩地对鲁迅与其笔下的“阿Q”进行一种双重视阈的解读来说明这一问题。首先就鲁迅来说，其作为“宗法社会的逆子”、“绅士阶级的贰臣”，不屑于士绅阶级“自己来做专权的诸葛亮，而叫四万万阿斗做名义上的主人”的虚伪意图，【瞿秋白】力图到回到“故乡”的“荒野”上，去寻找“群众”的“野兽性”。而其笔下的“阿Q”就体现了鲁迅的这一思考，罗岗认为，小说开篇“赵太爷不许阿Q姓赵”这一情节颇有趣味，赵太爷之所以不准阿Q姓赵仅仅是因为他“穷”，便认为“不配”，这实际上活描出一个底层乡民如何在实际的“乡村秩序”中被驱逐被欺凌，展现出与宗族联系紧密的“乡村共同体”伦理习俗和秩序的败坏。而这一“乡里空间”的崩溃导致着“士绅主导”合法性的终结与其历史位置的变换：正是因为赵老太爷把他从“乡里空间”中驱逐出来，才使得阿Q“想要革命”，但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士大夫支配民众”的构图，那么“假洋鬼子”必定和“赵秀才”之类“咸与维新”而不许阿Q“革命”。由此，“士绅主导”作为中国近代“革命建国”的一环必须要被超越，“人民主权”的确立就标志这种超越的开始。而另一方面，“民国理想”和“人民主权”又起着一种规范作用，为民国政治危机的克服提供思想资源。而这一危机主要在于“代议制”民主与其相关的“党派政治”的“代表性”的丧失，而这一危机的典型事件即是袁世凯被议会“民主”地恭立为皇帝。（在论述这一思路时，罗岗还以施密特的“主权”理论为工具，但论述中似乎无法贴合。或许我理解的浅薄，还需指教。）三、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就是一

## 《人民至上》

部不断提升“劳动”的意义与确立“劳动”的价值的历史，用“劳动”来确保“人民”的“主体”，把“人民”作为“劳动”的“道德”来源。而这里的“劳动”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而是与合作化密切联系的“集体劳动”。如果我们不从由结果的成败，而是从“集体劳动”和农业合作化所面对的历史境遇出发，能得到深刻地多认识。首先，必须一定程度上改造“个体经济”所依赖的基本单元——家庭，将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只有脱离家庭、远离农村的群众运动——进军队、进工厂、进学校，才有革命军，才有劳动力市场，才有知识分子等，才能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其次土地改革仅仅能解决“农民土地所有”的“起点公平”的问题，自发的“小农经济”如果任其发展，就必然出现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社会建设必须要打破这一“传统的循环”，还需要“集体劳动”的提倡。再次，“集体劳动”可以看做新中国在工业建设中，在资本极度稀缺的条件下，以高度的集体化和单位制、成规模地组织低成本的劳动力去替代稀缺的资本，最终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完成了国家工业化不可逾越的原始积累。毛认为，坚持集体劳动取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才能避免社会主义的失败。马克思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由于实行等量交换的“按劳分配”原则，因此还存在着类似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形式上平等”而“实质上不平等”（遵循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只按照“劳动”尺度，而不顾劳动者工作能力、赡养人口等的不同）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弃这种“资产阶级法权”，才能实现劳动关系的平等。

四、由上一章以“毛时代”为论述中心转入对“邓时代”的论述，罗岗认为作邓的重大政治规划与遗产在于对“共同富裕”的阐发。“共同富裕”的理想不仅接续了“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传统”，同时有着其更为深远的根基。“西方现代性”的“核心”在意识层面就是造就具有内在深度的“个人”，以此内化规训为“现代民族国家”和“劳动力市场”提供人力资源，而这种个人主义的兴起在西方历史上的标志是文艺复兴时期对“私”和“欲”的追求与提倡，因此以此为视角反观中国，往往将容易晚明对“私”、“欲”的肯定视为中国的个体主义的兴起与现代性的发端。但正如沟口雄三所强调的，这一时期思想家所高扬的“私”并非指向“个人”而是指向“乡村共同体”，是与“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的皇权相对，毋宁是另一种层次上的“公”。而这一传统流衍为明末清初时期私有制“民土”观的确立和民众自下而上要求土地“均”等的分配要求 清代普及开来的建立于私有制基础上的宗族制的“公有” 太平天国的“国家”共同体性质的公有 孙文等革命派“平均地权、耕者有其地”的土地政策 毛泽东的国家共同体的土地国有化政策。【沟口雄三】另一方面，这一传统也体现在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一系列“自下而上”的改革上，如“苏南模式”如南街村、华西村等都力图运用原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再分配体制来应对当下的市场经济实践，形成了各具形态的“共同体”经济。【费孝通】而这种以“共同体”为依托，利用相对廉价但熟练的劳动力在相对小规模单位工作的“勤劳革命”，与西方资本和能源密集的大工业发展模式相比，是一条迥异但绝非落伍的道路。其优势正在于“动员人力资源胜过非人力资源”，比西方道路更充分吸收运用劳动力，更少以来资本和机器取代劳动力。【杉原熏】“勤劳革命”继承着中国的“共同体”传统，并指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

# 《人民至上》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http://www.tushu000.com)